

徐世昌與洪憲帝制前後的袁世凱

林輝鋒

[提要] 徐世昌、袁世凱之間的特殊關係對近代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洪憲帝制前後兩年左右的時間裡，徐世昌先是在國務卿任上與袁氏密切配合，幫助其不斷加強獨裁統治。隨著袁氏公開帝制自為，徐、袁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徐世昌沒有附和復辟，亦未與袁氏公開決裂，而是選擇了消極抵制。帝制取消後，徐世昌出面助袁收拾殘局。袁氏死後，又為其主持處理喪事。《韜養齋日記》為瞭解這一時期的徐、袁關係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關鍵詞] 《韜養齋日記》 徐世昌 袁世凱 洪憲帝制

[中圖分類號] K8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1 - 0186 - 09

徐世昌與袁世凱曾經義結金蘭，兩人同為清末最重要的漢族大員。從小站練兵、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洪憲帝制，徐、袁之間的特殊關係對近代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之故，學者們對不同時期的徐、袁關係都給予高度重視，出現了不少相關研究成果。^①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利用徐世昌《韜養齋日記》^②，對 1914 年 5 月徐氏出任國務卿後至 1916 年 6 月袁世凱病死這段時期的徐、袁關係略作梳理，重點探討徐世昌在洪憲帝制前後扮演的角色。

—

辛亥革命後，徐世昌與清室和袁世凱之間的關係均十分密切。他沒有直接入仕民國，而是選擇避居青島作為緩衝，到 1914 年初才最終決定“出山”輔佐袁世凱。是年 2 月，徐氏門生王揖唐奉袁氏之命到青島迎其回京。徐世昌開始不願去，經過再三勸駕才表示接受。^③3 月 28 日，他抵達北京。甫一回京，便周旋於載灃、奕劻等宗室親貴及袁世凱之間，^④為自己出仕民國預做準備。

徐世昌之所以決定此時“出山”，誠如警民（費行簡）所言：

袁世凱既改約法，師美國為責任總統制，改內閣總理為國務卿之機要局局長也。任此第一任國務卿者為誰，即隱居青島之清太保徐氏也。當氏避地時，其表示於清室者，為遭逢鼎革，隱痛在心，從此不預世事；其表示於袁氏，則即任愧對清室，約二年後出山；

而此兩種表示，並不得謂為可信。蓋氏老謀深算，生平未嘗貿然從人，致一次陷危險。彼深知民國初建，黨人之囂張，各派之把持，以袁專斷，可決其若水火不相容。與其貿然出而任紛爭時代負疑負謗之總理，孰若少緩須臾出為統一時代養尊處優之國卿？所以一蒙特簡，欣然即出，蓋已計之爛熟矣。^⑤

所謂“改約法”，係指1914年3月袁世凱召集約法會議，制訂《中華民國約法》以取代《臨時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徐世昌之所以此時回京，與此事直接相關。此後情況如其在日記中所記，4月30日，“修定約法今日公佈。有人知會，今日大總統特任余為國務卿，約吳辟疆代擬呈辭”。5月1日，“晨起，會客，吳向之來勸駕，大總統遣來商酌各事。約吳辟疆來辦理呈詞代為呈遞。晚間即奉批敦勸：‘萬勿推辭’，又派段芝泉來勸駕，並送去年所辭之勳一位徽章、證書。午後寫字，小憩。大總統又派孫慕韓來敦勸明日即出任事，久談……午睡時，世博軒（世續——引者）來勸：‘出任事，不可推辭。’未晤”。^⑥

徐世昌此行本是為出任國務卿而來，辭職不過是稍做姿態而已。而世續所言自然代表了清室對此事的意見。從之前表示“遭逢鼎革，隱痛在心，從此不預世事”，到決定出任國務卿，前後反差甚大，徐氏身邊有遺老情結的友好紛紛表示不解，甚至對其加以責難。^⑦經過兩年左右的緩衝，又得到清室的支持，5月2日他便走馬上任。^⑧在該日日記中，他寫道：“晨起，到總統府見各部總長。謁大總統，談公事。各部會議，總統宴集。午後散，偕孫慕韓到國務院接見各員，辦公事，察看各院宇房舍。”^⑨

出任國務卿後，徐世昌自書“後樂堂”匾額，懸掛於政事堂，以示不敢“自耽安逸”。^⑩從1914年5月至1915年10月，前後17個月裡，公務十分繁忙，徐世昌幾乎每天都過著“晨起，到公府辦公。午刻歸，飯後辦公，會客”的生活。這一時期，他表現出極高的熱情和過人的精力，近一年半裡沒有一天休息，就連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也都在辦公中度過。期間，曾三次患病（1914年9月上旬腹瀉、痔瘡便血，同年12月下旬感冒，1915年4月中下旬眼疾），也都帶病堅持工作。^⑪

關於徐世昌擔任國務卿期間的工作情況，警民（費行簡）評論稱：

當氏出任國卿時，內之各部院，外之將軍、巡按，雖不必皆袁氏爪牙，而絕無孫黃餘黨混跡其中，故對於中央一致表示服從，而陸軍部之段祺瑞、參謀部之陳宦，其重視國卿，尤倍於向日之總理。世凱專主外交及對付黨人，其他官吏黜陟，俱世昌主持，一時東三省舊吏充塞內外……計其為國卿時間雖非甚長，而故人位置無遺，然初無攬權名，蓋其生平行事巧妙沉靜，大都類是。世凱奸雄，其才略非氏所及，若穩健深沉，似又在袁氏上矣。^⑫

任職期間，徐世昌在內政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⑬此外，外交方面也多有涉及，接見各國公使、顧問及來訪人士的記錄在日記中隨處可見。“一戰”爆發後，1914年8月4日，他“添外交會議，緣奧塞戰爭，德俄開釁，歐洲多事，東亞亦大有關係也”。^⑭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他參與北京政府的相關會議，“始終主婉辭拒絕，或聯英美抵制”。^⑮1915年5月8日，“到公府會議，今日議定答覆日本交涉最後文件和平了結，議事良久”。^⑯

出任國務卿之前，徐世昌的摯友周樹模曾專函勸告：“此次之出，乃為全國百姓，非為洹上（引者按：指袁世凱）一人。凡所設施，務在推誠，不用智數。一以止殺息爭為主，庶可以釋南

人之憤而解天下之疑”。^⑭從此後情況看，他出任國務卿確實並非僅為袁氏一人，但這一年多裡，正是袁氏從獨裁走向帝制的關鍵階段。徐世昌與其密切配合，殫精竭慮，無疑為他加強獨裁、走向復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

1914年5月正式公佈《中華民國約法》後，同年12月28日又由約法會議通過《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改為10年並可連任，繼任者由現任總統推薦。此時的袁世凱已經大權獨攬，實際上與皇帝沒有多大差別。1915年8月，正當徐世昌在國務卿任上埋頭苦幹之時，袁氏黨徒將復辟帝制推入到具體“勸進”階段。8月23日，楊度為首的“籌安會”成立。9月29日，梁士詒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並逐漸取代“籌安會”成為推動復辟帝制的中心。10月2日，參政院擬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8日正式公佈。至此，洪憲帝制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⑮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局，1915年10月初，徐世昌最終病倒，並提出辭職。據其日記所載：

10月1日，晨起，頭眩，未能到公府，複睡。起，看公事，簽字。飯後辦公，略寫字……一日大總統遣人來問病送藥數次。

10月2日，晨起，頭仍眩，複睡。劉竺生來為診視，云是虛風頭眩。飯後腹瀉二次。辦公，略寫字，服藥，小憩……又辦公，簽字。

10月3日，晨起，郭嘯麓來談，辦公。劉竺生來診脈，頭風仍未愈。飯後略辦公……

10月4日，晨起，寫信，複睡。劉竺生來診脈，據云此次病甚不輕，今日脈象稍好。辦公。飯後到前院辦公……

10月5日，晨起，因昨夜不成寐，頭風又作。看公事，小憩，劉竺生來診脈，辦公。飯後又辦公……

10月6日，晨起，寫信，劉竺生來診脈，辦公，又寫信。飯後光弟來久坐，小憩，辦公……連日大總統遣醫診視，遣人問候，送藥、送參，今日又遣其侄來問視……

10月7日，晨起，複睡，昨夜不寐。醫來診脈……飯後辦公……

10月8日，大總統遣人送信來問視。連日余欲辭職，書牘往還，又屢倩左右丞來肫肫相留。余以衰病，實不能再任重要責任，已堅辭矣……^⑯

從中可以看出，此次徐世昌是真病而不是假託生病，然而從此前多次帶病辦公的經歷看，他之所以提出辭職主要並非由於生病，而是由於袁世凱公開復辟帝制。

對於袁氏復辟帝制之舉，徐世昌究竟持何種態度？現有各種記載頗不相同。曾在袁氏身邊擔任要職的唐在禮認為，徐世昌對帝制“很表贊成”，據稱：

當時籌備帝制的總領頭是朱啟鈐……朱本人很會辦事，同時他遇事除了親自請示袁世凱外，主要是聽徐世昌支配。其時我們稱朱為“徐相國”的影子。徐對袁恢復帝制很表贊成，不過他經驗豐富，城府很深，表現得穩重，總是歡喜在幕後策劃，心裡很難使人推測。當時同僚們有這樣一些看法：認為袁在政治、軍事上做任何事，總離不開徐的策劃……當時大家明知拿總主意的是徐世昌，只是徐對帝制恢復的前途究竟順逆如何，尚無十分把握，所以看不見徐自己舉動上有明顯的表示，總是由朱出來執行他的策劃，而朱也一切聽他的支配……徐世昌的話，袁還是聽的。袁相信徐對自己恢復帝制的事是

堅決擁護的。^②

張之萬之孫、與徐有通家之好的張達驥認為，徐世昌對帝制持消極“觀望”態度，據載：1915年，“袁謀稱帝已成公開的秘密，徐自始至終無一言勸阻。有一天，袁召徐面談，問徐：‘外間勸進事，大哥知道麼？事可行麼？’徐沉默後說：‘我不知此事。’袁說：‘外間喧傳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袁素知其性情，知其是觀望的意思，即未再問。”^③警民（費行簡）則認為，徐氏在帝制問題上經歷了從支持到勸阻的變化過程，據稱：

袁氏之終必稱帝，世昌知之有素矣。當清末讓國時，段祺瑞主舉袁為民主，段芝貴主推袁代清。二者莫知適從，以決於世昌，世昌曰：“民主順時，姑取之以俟異日。”梁士詒議亦與相同。當第二次革命平定，適居青島，聞而告周馥曰：“從此慰庭得行其志矣。”所謂志者，即大位也。迨既出任國卿，見各省民黨謀反對甚烈，雖失敗而前僕後起，北洋軍人則馮國璋意漸攜貳，段祺瑞尤不直袁所為，東鄰日肆陰謀，以帝制為餌而攫我利權，知國體之不可遽改。世凱屢示意，皆默然不應。一日，載振銜奕劻命晉謁，謂項城天與人歸，似宜速正大位，俾使天下寧一。世昌笑曰：“然則君父子何不勸進？”振曰：“恐貽我宗人笑，故以告子，乞為領袖，敦勸項城。”曰：“然則我不獨畏貽舊日同官笑乎？望君勿再言。”振慙，沮去。以告克定，克定以其父唯徐言是從，遂以帝制說告之，且謂世凱意已決，乞勿見阻，世昌曰：“我不阻止，亦不贊成。聽諸君好為之。”一日，世凱小病，入問疾，適袁乃寬亦在座。世凱歎曰：“人生不能無疾病，生死殊不自料。以予自問，雖才不足望古，並世似無居予右者，然任事幾四年，志未盡展，設我去位，代任者雖已預舉其名藏之，然而其才力或尚遜於予，中國後來安危，正難預卜耳。”乃寬遽起對：“總統有任期，何足盡公才，毋寧改國體。”語至此，世凱以目視世昌，昌俯首若不聞者，遂罷議。然自是每晚不延世昌入計密事矣。克定知之，乃屬孫毓筠、楊度為籌安會，當發起時，氏即說世凱曰：“事雖勿論是非，而不可不計利害。默揣時勢，誠未敢期其必成。設竟廢於半途，將以何術轉圜？”袁聞論愕然，曰：“國中握有權力者，豈亦有反對我者乎？”世昌言：“陸榮廷等不必論，即相從最久之馮國璋、段祺瑞，已自有意見，故知其不易。”……世凱又告之曰：“今為眾人所推，予雖欲辭亦不可得。恐不日即成事實矣。”世昌曰：“事實不易成，私計苟稱帝，非有銀（疑漏千字）萬圓雖（難）辦。蓋典禮之籌備，言論之收買，軍隊之犒賞，皆將取資於是。而今日庫儲如洗，其以何法應付之？”世凱爽然，議中絀。已而梁士詒擔任財政，謂能以三旬籌足八千萬圓，袁父子大喜，遂買人勸進，進行益力。氏當此際，蓋有不得不去之勢矣……氏之反對帝制，蓋為袁一身熟計利害，而知其事之萬不可行也。然袁已醉心甚，言不能入，初以肺病辭，不允，遂不視事。克定告其父曰：“彼願為清室逸臣，曷放歸以成其高蹈？”世凱尚不允，而京師有為流言者，謂段（祺瑞）將舉義討袁，世昌為主謀，人皆知其荒誕不足信。而世凱則恐段徐世（外）里為害，於是遂許世昌去。第諄諄勸其駐津門，蓋慮其遠離，或為民黨所誘。^④

對於這些表述各異的記載，研究者常為論證自己觀點的需要各取所需，而甚少辨析其中的差異，更少思考它們的可靠性。在張國淦《洪憲遺聞》中，留下了徐氏自身對此事的一段表白：

國會解散，項城乃放手做去。自今思之，項城以約法會議改造新約法，又修改大總統選舉法，着着皆為帝制預謀之階梯。但在政事堂範圍以內，從無人露出帝制二字。自

八月籌安會發起，此幕業已揭開，項城未曾向余有一言之表示。既而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北京又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於是有國民代表大會之產生。其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前數日項城令顧鑿先送余閱，越日余問顧用意何在。顧答：大權在國民會議制定憲法。余言：須待討論。乃不及討論，即於十月八日公佈。此種做法，日趨明顯，余於是辭去國務卿之職。^②

按徐氏自稱，在復辟問題上袁世凱與其未曾“有一言之表示”。據此則前引張達驥及警民（費行簡）所記言之確鑿的對話均大成問題。不過從此前袁氏一向對其言聽計從來看，在帝制問題上兩人是否真的完全沒有交換過意見，也是值得懷疑的。

在日記中，徐世昌沒有直接表明其對洪憲帝制的看法，但還是留下了不少相關記載。在其提出辭職之後，袁世凱於10月10日派人前往探視，次日指派名醫前往診治，13日又親自前來探望。此後，還三次派人分別給徐世昌送來肉桂、鍍金壽星、銀食器及自跋洹上養壽園攝影。但徐世昌去意已決，23日，“具呈因病請辭職，並加函婉致之，其辭以期得請而後止”。24日，“光弟來談，大總統命其挽留，余仍婉辭謝之”。27日，“前日具呈辭職，大總統又派左右丞來商酌將前呈暫擱置，囑另具呈請假派署。今日已呈遞，奉策令派陸徵祥暫行兼代”。28日，“具呈派司務所長吳笈孫送所管大總統印璽各鑰牌十件、石室鎖鑰一件、政事堂印鑰一件，交政事堂轉交代理陸徵祥總長。檢點什物即移居回五條胡同本宅，到前院察看……昨日所具之呈奉批，令給假一個月，安心調理，俟假滿即行視事，已另令派員代理矣”。^③從提出辭職到由陸徵祥暫代，前後歷時20餘日。^④

正當徐氏堅請辭職之時，復辟活動緊鑼密鼓進行。10月25日起，選舉國民代表大會代表。28日，進行國體投票。12月11日，參政院公佈投票結果，全體“國民代表”均主張君主立憲。同日，又出現所謂的“總推戴書”。12日，袁世凱宣佈接受“推戴書”，次日又接受百官朝賀。^⑤袁氏復辟之舉對徐世昌而言是一大考驗，由於其與袁氏的特殊關係，稍有不慎便與復辟脫離不了干係。10月28日國體投票開始之時，徐世昌以告假名義從國務卿任上脫身，表明其對此事的消極抵制。

從日記看，徐世昌辭職後仍然一直在北京活動。^⑥12月20日，徐世昌與趙爾巽、李經羲、張謇四人被袁世凱封為“嵩山四友”。^⑦對此，他在21日日記中寫道：“昨日大總統有命令：推余同趙次珊、李仲先、張季直為‘嵩山四友’，所有國務卿一職即可自然開去矣。”22日又寫道：“昨日已有命令，陸子興（徵祥）已補實國務卿矣。卸卻仔肩，頗覺爽適。”^⑧後又收到政事堂送來優禮“嵩山四友”條例和“嵩山照像”。^⑨條例規定：（1）免其稱臣跪拜；（2）賞乘朝輿，到內宮換乘肩輿；（3）皇帝臨朝時，得設矮幾賜坐；（4）賞穿特種朝服；（5）每人給以歲費二萬元。對此，徐世昌並未感到絲毫欣喜，而是有一種徹底解脫的輕鬆感。在其看來，“所謂嵩山四友，即永不敘用之意”。^⑩

12月31日，袁世凱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並擬於1916年元旦登極。這一切在徐氏日記中絲毫見不到記載，也隱含著他對復辟不認可的態度。^⑪隨著護國軍興，天下擾攘，1916年1月26日，徐世昌在日記中留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世界上有三種有志之人：一為有志仙佛之人，一為有志聖賢之人，一為有志帝王之人。求為仙佛之人多則國弱，求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求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權者盍審諸。”^⑫這是他對袁氏帝制自為的委婉批評。結合此前其對“倡言歸政”問題的態度^⑬，可見徐氏內心並不認可袁氏復辟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從 1916 年 2 月 10 日起，徐世昌在日記中大量摘錄顏李學派的語錄。後來徐世昌在大總統任上大力提倡顏李之學，與這一階段他集中研讀顏李之學不無關係。而他此時之所以關注顏李之學，除學術因素外，與洪憲帝制前後的政局亂象恐怕亦不無關係。他所摘錄的李塋（恕谷）名言，大都結合了其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如“可交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耐風塵也；烈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⑤、“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於見短，好諛必受人愚”^⑥、“天下之安不安，始於宦途，終於草野”^⑦，等等，顯然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感而發。

三

至 1916 年 3 月，袁世凱已經陷入眾叛親離、內外交困的絕境，被迫請求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出來替他化解危局，由徐負責政治問題，由段負責軍事問題。

據徐氏日記載，3 月 20 日，“楊杏城、曹潤田奉大總統諭來談良久”。21 日，“楊杏城、曹潤田奉大總統命來談。飯後錢幹臣來久談，小憩，大總統遣車來迓至府久談，留晚飯。以時局危迫，再三約出維持大局，堅辭。近二更始歸，士湘在此，段芝泉來談”。^⑧在 21 日下午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決定撤銷承認帝位案，取消洪憲年號，以徐世昌為國務卿，段祺瑞為參謀總長，請黎、徐、段三人聯名電勸護國軍停戰議和。徐世昌一再推辭，袁世凱見狀又說了一套“老朋友不幫忙誰來幫忙”的話。^⑨在袁氏同意取消帝制的情況下，他只好答應出來收拾殘局。關於這一過程，徐氏在日記中載：22 日，“今日見命令，任為國務卿，已具呈辭”。23 日，“今日具呈辭國務卿重任，大總統派幹臣肫肫堅留，以時局危迫，非出面維持不可，有‘旋乾轉坤，非異人任’等語。本屬[囑]嘯麓擬稿，明日再辭職任，幹臣、潤田諸君力屬[囑]不可。當此之時，惟有勉任艱鉅，盡力維持國家大局而已”。^⑩

再次出任國務卿後，徐世昌又每日到公府辦公，與各方頻繁聯絡。雖然他力圖替袁世凱善後，不過形勢發展已與此前大相徑庭，作為一個文人在軍事鬥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不如武將。隨著局勢日益惡化，在與袁世凱多次久談之後，4 月 22 日再次辭職，由段祺瑞接任。^⑪計其此次任職前後不過一月之久^⑫，無甚作為可言。

從日記記載的情況看，他此次辭職後亦未離開北京。^⑬雖然不再擔任具體的職務，但依然與各方保持密切聯繫，絕非僅以田園詩書畫自娛。4 月 25 日、26 日、30 日，5 月 15 日，徐氏多次受邀到袁處久談。^⑭具體談話內容已難知曉，但肯定與軍政大事不無關係。這一時期，他與段祺瑞、王士珍等人的聯繫也十分頻繁。

1916 年 5 月間，陝南鎮守使陳樹藩、四川將軍陳宦及湖南將軍湯薌銘相繼宣佈獨立。在接連打擊下，袁世凱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延至 6 月初已經病入膏肓。關於袁氏臨終前徐世昌與其會面的情景，不少文獻中均有詳細記載，證諸徐氏日記所記，這些記載大都似是而非。^⑮徐世昌這一時期均在北京活動，根本不存在從外地趕回京師之事。^⑯6 月 3 日，徐世昌“到總統府視大總統病”。他與袁世凱最後一次見面是在 6 月 6 日凌晨，而非 6 月 5 日，具體情形見其日記所載：“6 月 6 日，未明即起，總統府遣人來知會大總統病重，即往視，其病狀已甚重，略言大局事。段芝泉、王聘卿均到，商量各事。日出後歸，小憩，陸閏（潤）生、傅良佐來。總統府又來知會，即往，大總統已於巳正薨逝。”^⑰在 6 日凌晨的會面中，曾與袁氏“略言大局事”，大體與其身後的政治安排有關。至該日上午 10 時許袁氏死時，徐世昌並不在旁。

袁氏身後，所有關於喪事的重大事項，均由“恭辦喪禮處”請示黎、段、徐等人辦理。^④在徐世昌等人的主持下，袁氏葬禮得以按“國葬”的標準隆重進行。^⑤徐世昌在日記中留下了不少關於袁世凱葬禮的記載：6月7日，“到總統府送殮行禮，夜深歸”。8日，“飯後到總統府，移柩停懷仁堂，均往行禮”。12日，“偕光弟、八弟、瓜弟同到總統府致祭袁總統，與承辦喪禮諸君談良久”。15日，“到總統府，承辦喪禮諸君約往商量各事，談良久”。18日，“飯後到總統府袁大總統幾筵前行禮，與承辦喪禮諸君商量各事”。26日，“偕光弟、瓜弟到總統府上祭，與楊杏城談”。28日，“黎明起，到總統府送殮。歸，小憩，寫字。飯後到火車站送靈輿起行”。8月22日，“已正到彰德……申初刻為袁大總統點主，偕田煥廷、嚴範孫橋梓、言仲遠、張馨庵、段香岩諸君與雲台久談”。8月23日，“為袁大總統送殮，午刻歸。飯後與曹潤田諸人談，小憩，看書。到趙次珊前輩寓舍談。酉刻袁大總統安葬，偕諸友往會焉。又偕諸友見袁夫人及其諸公子商作外壙辦法，因田煥廷省長擔任此事，須面商定也”。^⑥之所以如此重視袁氏葬禮，除其與袁世凱的特殊關係外，也與整個北洋派系的集體利益有關。對他們而言，倘若徹底否定袁世凱，無疑也就否定了自身繼續執政的合法性。

對於袁氏之死，徐世昌甚為哀傷，在當日日記中他寫道：“數十年老友一旦怛化，為之痛哭。其夫人、諸子均出見，甚哀痛。”^⑦對於袁氏帝制自為的做法，他則另有看法，除前述對“好為帝王者”的含蓄批評外，在1916年6月17日日記裡，徐世昌還留下了另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複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⑧仔細玩味，這段話實不無批評袁氏好用“詭道”之意。此外，在與張國淦談及此事時，徐世昌稱：“項城一生走穩著，獨帝制一幕趨於險著，此余之所不解者……在項城左右，以新勢力尚未養成，不得不勾結張勳、倪嗣沖（此時倪尚未投段）等極舊派以抵制段、馮，某公子皆主其謀。而項城遂陷於孤立，以致失敗。”^⑨由此亦可見其對袁氏帝制自為之舉的看法。

在洪憲帝制前後兩年左右時間裡，徐、袁關係的變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徐世昌在國務卿任上與袁世凱密切配合，幫助其不斷加強獨裁統治。隨著袁世凱公開帝制自為，徐、袁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徐世昌沒有附和復辟，也沒有與袁氏公開決裂，而是選擇了謹慎的消極抵制。這一選擇源於其對形勢的綜合判斷，也和他與袁氏之間“義結金蘭”的特殊關係及其處事圓滑的個性有關。在帝制取消後，徐世昌出面助其收拾殘局。袁氏死後，又為其處理喪事。這既出於個人交情，也出於維護北洋派系整體利益的需要。

①相關成果主要包括兩類：一是各種徐世昌、袁世凱的傳記，如警民（費行簡）的《徐世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4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沈雲龍的《徐世昌評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郭劍林的《北洋靈魂徐世昌》（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郭劍林、郭暉的《翰林總統徐世昌》（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年），陶菊隱的《袁世凱演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陳志讓的《袁世凱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等等，這些傳記對不同時期的徐、袁關係均有較多論述；二是直接研究某一時期徐、袁關係的一些論著，如侯宜傑的《1896年袁世凱被參與徐世昌受聘無關》（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辛亥革命爆發後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會見袁世凱》（北京：《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景東升的《徐世昌對洪憲帝制的謹慎抵制》（安徽安慶：《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等等。

- ②《韜養齋日記》起於1885年2月15日，終於1939年5月19日，全稿148萬餘字。該日記廣泛記載徐世昌在半個多世紀裡生活起居、讀書治學、仕途升遷、友朋交往等方面的情況，對研究近代政治史、文化史均有重要價值。原稿藏於天津社會科學院，本文所引用的是一份未刊整理稿，以下不另作說明。在此，對整理者謹致謝忱。
- ③陶菊隱：《袁世凱演義》，第329頁；《韜養齋日記》，1914年2月2日、3日。
- ④《韜養齋日記》，1914年3月29日、31日，4月1日、21日。
- ⑤⑫⑮⑳警民（費行簡）：《徐世昌》，第26～27、27、27、28～30頁。
- ⑥《韜養齋日記》，1914年4月28日、5月1日。
- ⑦㉑張達驥：《袁世凱與徐世昌》，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207～208頁。
- ⑧《翰林總統徐世昌》記徐世昌5月4日才開始上任（見該書第237頁），時間不確。
- ⑨《韜養齋日記》，1914年5月2日。
- ⑩⑬⑰《翰林總統徐世昌》，第237～238頁。
- ⑪見《韜養齋日記》相關月日。
- ⑭《韜養齋日記》，1914年8月4日。
- ⑮《韜養齋日記》，1914年8月4日。據警民載：“定約翌日，氏即託病不至政事堂，凡十餘日。袁頻勸駕乃起，而自是寵亦少衰矣。”（《徐世昌》，第27～28頁）。此處不確，從日記看，徐氏並無託病不至政事堂辦公之事。
- ⑯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355～360頁；謝本書：《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72頁。
- ⑰《韜養齋日記》，1915年10月1～8日。
- ⑱唐在禮：《辛亥前後的袁世凱》，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第165～166頁。
- ㉒⑳張國淦：《洪憲遺聞》，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83～285頁。
- ㉓《韜養齋日記》，1915年10月10～28日。
- ㉔張達驥稱徐氏“託病請辭”是在袁稱帝之後（《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08頁），不確。
- ㉕謝本書：《袁世凱與北洋軍閥》，第73～74頁。
- ㉖警民稱徐氏辭職後駐天津（《徐世昌》，第30頁），《翰林總統徐世昌》一書則稱其辭職後居河南輝縣，均不確。
- ㉗陶菊隱：《袁世凱演義》，第455頁。
- ㉘《韜養齋日記》，1915年12月21日、22日。
- ㉙《韜養齋日記》，1916年1月31日、3月15日。
- ㉚張達驥：《袁世凱與徐世昌》，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08頁。張達驥稱，徐世昌對“嵩山四友”之封“謝而不受”，從徐氏日記中的相關記載看，他似乎並未辭謝。
- ㉛那桐對此事的態度截然不同，1916年初起他在日記中即改用“中華帝國”紀元，以示對洪憲帝制的認可。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814頁。
- ㉜《韜養齋日記》，1916年1月26日。
- ㉝景東升：《徐世昌對洪憲帝制的謹慎抵制》，安徽安慶：《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 ㉞《韜養齋日記》，1916年2月10日。
- ㉟《韜養齋日記》，1916年2月24日。
- ㊱《韜養齋日記》，1916年5月27日。
- ㊲《韜養齋日記》，1916年3月20日、21日。楊杏城，即楊士琦；曹潤田，即曹汝霖；錢幹臣，即錢能訓；段芝泉，即段祺瑞。
- ㊳陶菊隱：《袁世凱演義》，第510頁。《翰林總統徐世昌》一書將會議時間誤記為3月22日（見該書第246頁），不確。
- ㊴《韜養齋日記》，1916年3月20日、21日。
- ㊵《韜養齋日記》，1916年4月14～23日。
- ㊶參見《翰林總統徐世昌》，第247～248頁；《袁世凱演義》，第527頁。關於這段經歷，據警民載：“及再任事，首電致國璋等謂元首以息事寧人為念，取銷帝制，若有不體此意，恣謀獨立者，皆自絕生成，應予誅伐，而我同胞，亦應努力同心，共衛中央云云……無何，浙獨立，南中爭責袁退位，袁議大舉征南，世昌謂陳宜巧滑難信，川事必不可支，已而陳果變……自以經驗雖富，而指揮調度非所諳，力薦段祺瑞以陸長兼組內閣，冀平南亂。蓋其時陳樹藩已逐陸建章於陝西，晉、豫皆帖危，然知樹藩實承祺瑞旨，非祺瑞秉政，戰禍斷不能已。世凱亦然其言，遂任祺瑞為總理，組織內閣，允世昌辭職去。”（《徐

世昌》，第31頁）。按此，徐氏辭職與陳樹藩、陳宜宣佈獨立有關，實則二陳宣佈獨立均在他辭職之後，此處所載顯然顛倒了時序。

④③警民稱其辭職後回河南輝縣（《徐世昌》，第32頁），《翰林總統徐世昌》亦持此說（見該書第248頁），均不確。

④④《韜養齋日記》，1916年4~5月相應日期。

④⑤此類記載甚多，如警民載：“帝制失敗，袁氏愁憤致疾，病篤時，飛電召世昌入京師。比至，袁已彌留，相見揮涕，謂曩不聽兄言，致有今日。國事任黎、段為之。唯家事恐兒子輩處分不當，敢以託兄，且乞主持喪務。世昌慨然許諾”（《徐世昌》，第32頁）。袁氏之女袁靜雪載：“到了黃昏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是夠危險的了，卻又認為或者還不至於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來，把大總統印交付給徐世昌，並且和他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從此以後，我父親才漸漸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舊曆五月初六日（陽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時，就死去了”（《八十三天皇帝夢》，第65頁）。陶菊隱則稱：“六月五日，袁的精神越來越不濟事，請法國醫生打了一針強心針，神志才略略清醒點。他自知死期將至，傳命把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張鎮芳四人請到公府來做他的‘顧命大臣’。當徐世昌最後

趕到時，袁向他望了一眼說：‘菊人來得正好，我已經是不中用的人了。’徐安慰他說：‘總統不必心焦，靜養幾天自然會好的。’但又接下去說：‘總統有話，早點安排出來也好。’袁的嘴唇微微動彈了一下，弱如游絲地吐出‘約法’兩個字來”（《袁世凱演義》，第550~551頁）。

④⑥有學者稱，得知袁世凱病危後，徐世昌從河南衛輝趕回北京（陳志讓：《袁世凱傳》，第251頁），不確。

④⑦《韜養齋日記》，1916年6月3~6日。

④⑧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第68頁。

④⑨袁世凱葬禮情況詳見《袁世凱演義》第556頁，《翰林總統徐世昌》第254~255頁。

④⑩《韜養齋日記》，1916年6月、8月相關日期。趙次珊，即趙爾巽。

④⑪《韜養齋日記》，1916年6月6日。

④⑫《韜養齋日記》，1916年6月17日。

作者簡介：林輝鋒，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責任編輯 陳志雄]